

孔朝晖 著

“兄弟”的隐喻

从《真理报》(1950-1959)的
中国形象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兄弟”的隐喻

从《真理报》(1950-1959)的
中国形象谈起

孔朝晖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 / 孔朝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61 - 1198 - 7

I. ①兄… II. ①孔…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58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苏联时代中国形象研究的一项有益尝试

孔朝晖博士的大作《“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出版了，可喜可贺。

该书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真理报》（《Правда》）。“真理”（правда），在俄语中内涵比较丰富，不能不略作分判。俄罗斯从有文字开始，即有种种被称为“真理”的书。公元11世纪初，《雅罗斯拉夫真理》（《Правда Ярослава》）问世了，它乃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后来人们就用“俄罗斯真理”（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来指称法典。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革命家暗中酝酿推翻或改良俄国的专制制度，其中的П. 佩斯杰利精心构撰的政治文献也被命名为《俄罗斯真理》。根据列宁的倡议，《真理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1912年5月5日出了第1期，以后逐日出刊。十月革命后，《真理报》成了后来的苏共中央的机关报，与作为政府报的《消息报》竞相媲美，而略胜一筹，其记者遍及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1978年印数高达1060万份。1991年“八一九”之后，叶利钦下令解散苏共，将包括《真理报》在内的共产党资产收归俄罗斯联邦政府。很快就有人以同仁报纸的形式登记出刊《真理报》。以后在《真理报》的这个名目下几易其主。根据俄联邦共

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97年《真理报》作为俄联邦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出版。新世纪刚满十载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大学访学，对坊间的报纸略有所顾。新办的《俄罗斯日报》经常公布国家和政府法令，该报新闻报道中也隐含着官方意图，这让一般读者对之颇感兴趣。《消息报》成功转型，一变而为大众报纸，每逢热点问题，随即采访高官政要，学者名流，赋予公众判断国是若干视角，也很好看。唯独《真理报》倍显凄清，每周只出三刊，印数极小，一般报亭断难寻觅其踪影。其上偶有篇幅较大的文章，批判声讨，用语激烈，建构乏术，似乎难以吸引解体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其声音独异，让手握巨资的大鳄不愿对其青眼相向。该报守持独立品格，拒绝随时俗俯仰，令人敬重。孔博士的大作着眼的乃是《真理报》极盛之时。今日之衰，更显彼时之盛。盛衰倏忽，令人唏嘘之余，难免不溯端竟委，深长思之。作为苏联最重要的报纸，《真理报》自然是研究苏联时代中国形象建构的最重要的资料。

中国形象是本著作的又一关键词。中俄为近邻，天造地设，历史恩怨，难以悉数。其嘉我惠我，当志之不忘。中俄地理之近，反倒凸现了彼此文化之远。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应明了俄罗斯人对自己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自我意识。对此我曾著文略加论列。虽然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朝，俄罗斯承袭欧陆中国乃哲人之邦的昵称，然而它的俯视，它的傲岸，代或有之。究其内驱的力量，其实源于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其一，《往年纪事》及18世纪前的文献都证实，俄罗斯人在想象中将自己民族的源头回溯到诺亚之子雅弗，将其王公的来历或追根至诺曼人，或寻缘到罗马帝国王族。希伯来文化的臆断，使俄罗斯人有了基督教文化的凭依，罗马帝国苗裔的猜想，坐实了俄罗斯人西欧文化的后盾。其二，到了15世纪末，普斯科夫的教士非洛费伊阐

发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之高论。后来通过一系列关于俄罗斯王公的衣钵来自拜占庭的传说 [如《弗拉基米尔大公家族纪事》(《Сказание о князьях Владимирских》)、《关于诺夫戈诺德的白僧冠的传说》(《Повесть о новгородском белом келобуке》)等], 逐渐发展出了俄罗斯人是上帝选民的弥赛亚意识, 这提供了俄罗斯地缘政治行为的宗教合法化论证。其三, 19 世纪又出现了关于建立斯拉夫大帝国的狂想。Н. 达尼列夫斯基、Н. 斯特拉霍夫和 А. 科舍列夫等对斯拉夫民族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的理论预设, 成了他们提出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联合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联盟的必要性的政治依据。普希金、丘切夫诸人在其诗作中想象了这个帝国的巨大的版图。有此三端, 非欧洲的、非基督教的族裔, 容易流为其以基督教之名义教化、俯视、征服的对象。好在 20 世纪末俄罗斯有若干汉学家倡导新欧亚主义, 这种文化间的紧张关系似有所舒缓。

孔朝晖博士立志于学, 先习俄语语言文学, 后留意于西方现代派文学, 再后来又对苏联媒体兴趣盎然, 负笈南北, 游学俄京, 转益多师, 其论文发表于中俄文杂志, 可谓后学可畏。今天《“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 的中国形象谈起》正式出版, 是她学术上又一项收获, 是苏联时代中国形象研究的一项有益尝试。该书从《真理报》中勾稽出不少资料, 又辅之以理论分析, 分五章详加阐述。书中不少观点值得关注。如通过第四章的分析, 她看出了通过《真理报》等媒体, “兄弟”关系在中国和苏联民众中具有双向塑造作用: 尽管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与殖民无关, 但实际上从苏联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方式。苏联官方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制度化(政治、经济、土地改革, 等等)和符码化(文化艺术的强制性话语形态)的过程, 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重要

一员——的想象转移到了中国人民身上，并在十年当中成功塑造了中国人对自我的想象：照搬苏联模式。报纸为“重现”这种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大力支持。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一名普通公民每天拿到《真理报》时，便会感到中国人与他一样享受着社会主义带来的幸福。当苏中两国的人民在歌唱《莫斯科——北京》时，他们便经历了同时性的体验，苏联人民和中国人就身处于被共同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联结在一起的想象的共同体。再如在第五章中，她分析了苏联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将中国视为文化上的他者等问题，进而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和中国形象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多变性，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隐忧。隐忧直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俄罗斯传统的亲欧性和自我文化崇拜，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普遍的、大众化的求知欲。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被政治遮蔽的重要因素。中国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政治上的“兄弟”，而却是文化的“他者”。苏联树立自身的国际权威和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它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而东西方文化差异却造成了它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该著作摆在读者面前，是深是浅，是生涩还是圆融，读者方家自会明鉴。

祝孔朝晖博士以此书为起点，更进一步。中苏、中俄文化交流历史不长，但其内涵既丰富又复杂。愿她此志益坚，著述益富，也更有益于我们反思文化的独立不羁与交汇容纳的辩证关系。是为序。

刘亚丁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2)
一 选择形象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	(2)
二 选择《真理报》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6)
第二节 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	(8)
一 国外研究状况	(8)
二 国内研究状况	(12)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7)
一 对象	(17)
二 方法	(18)
 第一章 在“强邻”与“弱友”之间摇摆:中国形象在 俄罗斯的流变史	(29)
第一节 从神秘大国到弱小邻邦:沙俄时代的 中国形象	(31)
一 初始想象: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约 16 世纪 之前)	(31)
二 直面中国:地大物博、文化丰富的贸易伙伴 (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初)	(34)

2 / “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

三 学习榜样:尊孔奉儒的智者帝国(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	(38)
四 文化大国:俄罗斯传教士与汉学家的贡献 (18 世纪至 19 世纪)	(45)
五 形象倾覆:可欺可辱的贫弱中国(清朝末期)	(48)
六 疑虑:中国——“黄祸”?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	(52)
第二节 从兄弟到敌人:苏(俄)联时代的中国形象	(56)
一 革命者和同盟军:十月革命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形象	(56)
二 狂热的毛主义:敌对的中国形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62)
三 变强又“变色”的中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疑虑	(66)
第三节 从危险邻国到战略合作伙伴:新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72)
一 危险邻国:自我价值观危机与“中国威胁论”	(72)
二 假冒伪劣的中国(商品):对中国的信任危机	(74)
三 战略伙伴:中国的新形象	(76)
四 复杂而模糊的中国:当代俄罗斯民间对中国的认识	(77)
小结	(80)

第二章 完美轮廓: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真理报》

中的概貌	(83)
------------	------

第一节 套话抑或刻板印象?《真理报》与中国形象研究的关系	(84)
------------------------------------	------

一 “套话”与“刻板印象”	(84)
二 报刊文本与形象学的跨文化研究	(87)
第二节 《真理报》(1950—1959)及其有关中国的	
报道概要	(91)
一 苏联官方的喉舌——《真理报》	(91)
二 分析方法概述	(96)
第三节 《真理报》对中国整体形象有计划有规律的	
正面宣传	(101)
一 对所有报道的定量分析	(101)
二 定性分析	(112)
小结	(114)
第三章 兄弟、盟友和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的神话化 ...	(116)
第一节 言说中国：苏联的集体话语模式	(117)
一 苏联的集体话语模式	(117)
二 《真理报》话语模式分析	(122)
第二节 中国神话：苏联自我神话的延续	(137)
一 符号学与神话理论	(137)
二 《真理报》的神话化过程	(139)
三 当“神话”变为“现实”	(146)
第三节 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镜像	(148)
一 意识形态	(148)
二 《真理报》的意识形态建构	(151)
三 权力的媒介：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对其媒体的	
绝对控制	(157)
小结	(159)

第四章 单面形象的多维支持:“中国兄弟”的形象学

构成原理	(161)
第一节 词汇网络中的单面形象	(162)
一 关于中国的关键词和幻觉词	(162)
二 形象在文本结构层层推进中逐渐清晰	(167)
第二节 多元互文环境中的单面形象	(195)
一 叙事序列	(196)
二 基本态度	(198)
三 互文性阐释	(199)
第三节 特写和游记:媒体对单面形象的文学支持	(208)
一 概念界定:特写与游记的文学性和新闻性	(209)
二 预先的想象:中国形象形成的特定思维空间	(212)
三 强化的视域:中国形象在苏联文本中形成的 中方因素	(221)
小结	(227)

第五章 政治的“兄弟”与文化的“他者”

(229)

第一节 “兄弟”的隐喻:苏联塑造中国形象的

唯政治性	(230)
一 救世主:俄罗斯传统的政治定位	(230)
二 苏维埃文化的一元性	(239)
三 中国威胁:苏联挥之不去的隐忧	(243)
第二节 文化的“他者”	(245)
一 苏中文化交流的严重失衡	(246)
二 俄罗斯文化的几个起源	(257)
三 本国文化中的“东方因素”并不等于接纳 中国文化	(260)

小结	(264)
余论 认清自我身份,走出“兄弟”之维	(265)
第一节 认清自我身份	(265)
第二节 走出“兄弟”之维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84)

绪 论

中俄关系继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到一个高不可及的阶段之后，经历了迅速的回落、破裂、冷战和观望，在 21 世纪初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6 年和 2007 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2010 年和 2011 年又互办语言年，更是将这种良好的国家关系推向了高潮。在这种局面下，对俄罗斯深入的文化研究越发显得重要。这其中，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从俄罗斯历史文本中有关的中国形象入手，不但能厘清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更可借助中国在俄罗斯深层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形象，看到俄罗斯在民族起源和国家现代性进程中的自我意识。这无疑是客观判断中俄在国际关系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两国意识形态交流的长远方法，也是文学研究对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贡献。

俄罗斯是一个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跨越东、西方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个纯粹的东方国家。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了一个交集：东方，而同时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对立——东与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中苏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作为地理关系密切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交流，对两国在外交与国内发展上来说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两国间彼此对对方的认识与深入了解便成为交流的基础和可能。通过研究俄苏在

“中苏蜜月期(1950—1959)”间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来观察俄中文化关系和彼此注视的心理,并不是要强化某种联盟状态,更不是专为找出对立,而是试图减轻长期萦绕在两国心目中的某种固化的立场,让两国间那总是摇摆于亲密与疏离之两极的微妙关系变成真正平等对话式的关系。

第一节 研究意义

一 选择形象学研究的目的是价值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imagologie),并不是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①如“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等。

19世纪,当比较文学从法国发端时,就开创了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而影响有时很难确指,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所阅读和接受的外国文学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用事实来阐明的。在这种实证主义方法日趋僵硬的情形下,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玛丽·卡雷(又译为:让-玛丽·迦列 Jean-Marie Carre, 1887—1958)明确提出了形象学的研究原则:在研究事实的联系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当注重研究“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②这样,他虽然没有专门提出“形象学”这个词,但已提出了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来,他的学生,同样是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的基亚又进一步将其归结为:“不再追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② [法]让-玛丽·迦列:《〈比较文学〉序言》,转引自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寻一些使人产生错觉的总体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①

在他们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重了解文学怎样以变化多端的形式在表现异国和传播异国文化中，同时充当了形象制作者和传播媒介这两种角色。

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于1989年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比较文学形象学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巴柔对形象所下的定义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②也就是说，当代形象学研究注重的并不是考察一国文本中对异国形象的描述是否真实，而是这种异国形象作为“被注视者”在被描述或者被想象甚至被定型的过程中，反映了“注视者（国）”怎样的文化心理和自我意识。形象不仅被看做作家个人的创作，更被看做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形象学研究的目的也就不仅在于揭示一个作家，更在于揭示一种文化在言说“他者”时所特有的规律、原则和惯例。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在更广阔背景下研究“他者”，也就是说，不仅要研究文本中单个的“套话”（stereotype），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总体想象物”（imaginaire social）。

① [法]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②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所谓“套话”，是法文“stéréotypé”的汉译。该词原指印刷业中的“铅版”，形象学研究中使用该词的转义，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和词组。如，中国人常用来指称西方人的“大鼻子”、“老毛子”，或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严谨”等。套话是形象在文本中一种特殊而又普遍存在的形式，“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释放出信息的一个最小形式，以进行最大限度、最广泛的信息交流”。^① 它既是对一种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高度浓缩。

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所作的阐释，是双极性（认同性 *identite*/相异性 *alterite*）的阐释”，^② 也就是全社会对一个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作出的集体阐释。这一阐释与作为个体的作家的阐释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研究社会总体想象物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制造了异国形象的“注视国”社会群体得到显现。它明显地与“事件、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③ 相关联。

“异国”标示出了一个社会的界限，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而作为“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则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凡是与国际关系有关的文化作品，包括新闻报道在内，都是在这个广

①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总体与比较文学》，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②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布吕奈尔、谢夫莱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 135 页。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③ 同上。

阔的背景上形成的。所以形象学的研究必须按照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因而，它实际处于“文学史、政治史和民族心理学几个领域的交叉口上”。^①

国内比较文学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就曾说法国的形象学研究“一方面表示形象学研究属于影响与接受研究的大范畴，它的终极指向是国际关系史和文学史；另一方面又向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学科领域延伸，并以此来武装自己，从而使异域形象学进入跨学科的‘总体文学’研究的范畴”。^②

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论，不仅可以让我们从彼此的文学文本中审视和研究对方国家这个“他者”，更可以扩展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清“他者”，反省“自我”。

俄罗斯或苏联，对于中国来说正是“异国”。中国近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及主流媒体报道在不同的历史、政治背景中，为中国人建构了这个“异国”或“他者”的不同形象。它们既有清晰的套话，也有由套话所组成的集体想象物。套话如八国联军中的“老毛子”、十月革命中的苏联红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员、“中苏蜜月期”中的“老大哥”、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苏修”形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硬汉”形象，等等。集体想象物则是经历了从沙皇专制下极富侵略性的俄罗斯、伟大的神话般的社会主义苏联到解体后动荡飘摇而又强权的新俄罗斯的变化。

① [德] M. 施坦格：《比较文学为何存在？》（Pourquoi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载《文学研究》（*Etudes de lettres*）1974年第3期，洛桑。转引自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②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